

12

安徽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史資料

(文化教育方面)

1981/12
第十五輯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年·合肥

封面题字：张恺帆

封面设计：贾愚

安徽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字数：187,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11102·43 定价：0.67元

目 录

教 育

清末安徽教育概述	宗 华	(1)
在皖江中学堂肄业的一年	俞道五	(14)
胡晋接及其对徽州教育事业的贡献	颜 永	(19)
土地革命时期皖西苏区文化教育	顾 旭	(34)
三农建校与六安初期学生运动	刘月舫	(46)
一九二五年芜湖教会学校学潮概述	徐则浩	(58)
巢县黄麓师范学校简介		
.....王德培 曹大启 王纪晴 张立潮	(70)	
旧社会的海峰女校	熊斗南	(80)
新四军四师创办抗大四分校前后	熊航昌	(90)
新桂系时期的安徽教育	王立仁	(97)
安徽学院的片断回忆	詹云青	(103)

文 化

三十年代左联安徽分盟与《百灵》月刊	班志洲	(113)
回忆安徽早期的话剧活动	李培仁	(122)
回忆安徽省立图书馆	蒋元卿	(131)
庐剧的沿革与发展	辛 人 诗 珠	(144)

报 刊

- 近代报刊发展史料综述 徐天琪(149)
芜湖报业简史 张孝康(162)
解放前屯溪的新闻界 汪则之(176)
回忆张治中先生委派我办《黄麓导报》 杨先礼(194)

历史人物

- 阿英早期文化活动 姚永森(200)
吴黎甫先生轶闻 何晓履(207)
房秩五先生事略 何晓履(212)
回忆刘希平先生 石原皋(220)
《忆张树侯》一文的补充 杨慕起(231)
我所知道的樊映川教授 唐德纯(238)
李则纲先生二三事 何 鸥(243)
严凤英小传 王冠亚(251)
咏严凤英 林散之(269)
余幼泉先生传略 唐遐龄(273)

清末安徽教育概述

宗 华

安徽兴办学校，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设立求是学堂开始的。时值中日甲午战后，清王朝更加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华侵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全国人民亟希发奋图强，有识之士主张废旧布新，“维新运动”在各大城市很快发展起来，因而，求是学堂便应运而生。从这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可以说是安徽学校教育的草创时期。现就其大概情况作如下分述。

（一）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安徽在一八九八年以前，负责实施传统封建教育的主要 是书院。随着时势的变化和发展，这种科举讲习所式的书院弊病益形暴露，越来越不能适应需要，皖抚邓华熙迫于形势，锐意改革教育。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邓抚在呈请开办学堂的奏札中说：“熟权时势，今之宜讲求西学，以造就人才。”其具体的理由，一是旧有的书院担不起发展西学的重责；二是京、津、沪已有头等学堂，要保证它们的学生来源，各省宜办二等学堂；三是要改变当时对于西学的敷衍不实之风，必须实事求是，以使教育能够切实。他在奏札上还拟定学堂名为“求是学堂”，并强调学堂既重西学的学

习，尤重圣贤义理的熏陶。这很合清政府的意旨，所以他得到了“与泛言设学者有别，自应准如所请”的批复。次年，安徽求是学堂便于省会安庆正式开办，招收了正课生六十七名，附课生二十六名，这就是安徽省有学校以来的第一批学生。尔后在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潜山县设置官立高等小学堂，又首开安徽小学教育之端。但是，那时由于封建顽固派的竭力阻挠，新式学堂很难发展，全省教育的使命仍由书院担负。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签订了可耻的《辛丑条约》。西太后为了缓和同人民的矛盾，保持自己的统治，即在当年宣布实施所谓“新政”，谕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又将《釐订学堂章程》颁布全国，通饬各省广设学堂；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室慑于各方压力，“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在这种情势下，安徽的新教育开始有所发展，学堂数量逐年有所增加。一九〇二年春产生了安徽最早的一批中学，即桐城吴汝纶倡办的桐城中学堂、合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创办的庐州中学堂、舒城县令万祖恕设立的斌农中学堂和陈仲甫（陈独秀）等创立的尚志学堂。此后，各地的学堂先后就书院、考棚及部分庙宇改办起来。据现有资料统计，全省的学堂，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有十三所，一九〇四年有四十一所，一九〇五年有八十所，一九〇六年有一百九十八所，一九〇七年有二百九十三所，一九〇八年有五百零三所，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有七百二十三所。七年之间，平均每年几乎增加一百多所。按照学堂的类别，一九〇九年的七百二十三所学堂中有专门学堂七所、实业学堂七所、初

级师范八所、师范讲习所九所、中学堂二十五所、两等小学一百四十七所、高等小学七十四所、半日学校十三所、女子学堂十六所、蒙养院（幼儿园）八所。由于那时的学堂处于初创阶段，在校学生人数不多。据一九〇八年统计，全省二十三所中学堂，学生人数最多的是颍州府立中学堂，为一百三十三人，学生人数最少的是广德州立中学堂，为十五人，平均每校约六十七人，总共一千五百四十八人。当时全省人口约为一千五百万，每万人中只有中学生一人。而且，那个时期的学堂，大都集中于省会、府城及较大的商埠，以省会安庆为最多。广大农村则私塾林立，几乎每村都有。除此而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教会学校。自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到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计有安庆的圣保罗学堂和培德女学堂、芜湖的圣雅各学堂和萃文学堂、合肥的三育学堂以及怀远的淮西学堂等中学堂，还有求道、天恩等小学，主要是传习教义和经义，进行奴化教育。

安徽的中等专业教育在这个时期也有所草创，在专门学堂中，法政学堂居于重要地位。一九〇六年就课吏馆改设的省立安徽法政学堂就是一所培养官僚和律师的干部学校。该堂开始以“造就已仕人才”为目的，后经两次扩充，编设豫、正、别及讲习、简易五科，学生达到五百余人，分官班、绅班两种。另设夜班简易科，以便省城在职要员们学习提高。以徐锡麟为监督的高等巡警学堂是一所公安干部学校。该堂开办于一九〇六年，开始只有本省绅班学生八十七人，后添客籍绅班十人，复招候补官班学生五十人。一九〇七年七月，徐锡麟击毙巡抚恩铭，率领巡警学堂学生进攻军械局，起义失败被捕后英勇就义，该堂也随之停办。开安徽师

范教育之先河的，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徽州府官立师范学堂，它是就著名的紫阳书院改建的，属于简易性质，学生多是贫寒塾师。继之，则有安徽高等学堂附设的师范班及安徽师范学堂和安徽全省公立女子师范学堂等。安徽师范学堂（后为优级师范学堂）成立于一九〇六年二月，第一届学生有二百七十二名，分为六班，三班为初级简易科，三班为优级选科预备班，于一九〇八年同时毕业。简易科诸生陆续派往原地充任小学教员，预备班诸生进入选科继续深造。在实业教育方面，最早创办的是颍州府立蚕桑学堂（一九〇七年），其次就是桐城私立工业传习所和安徽官立中等实业学堂（一九〇八年）。工业传习所传授的是简单的化学工业技术，学生仅能制造洋蜡烛及各种肥皂。中等实业学堂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为藩宪沈曾植所办。堂内设有工、农、商三科，每科学额二百人，共有学生六百人，分预科、本科教授，这所学校在当时为培养中等专业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安徽的留学教育，始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分官费、私费两种。开始都是留学日本，首批赴日的留学生是方时简、潘赞化两人，然后逐年有所增加，到一九〇八年共有留日学生七十七人。一九〇八年二月，安徽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第一批有丁绪贤、鲍璕等十二人，往后留美学生逐渐增加。一九〇九年，安徽提学使司在省内举行第一次留美考试，选送了十名留美学生。

新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当时安徽一班顽固守旧的封建官僚、腐儒学家的恐慌和仇视。他们或作联咒骂学堂；或办专授经史古文的私塾相对抗；或利用手中权力，反对甚

至妄图扼杀学堂。对于他们的这些行径，当时安徽许多先进人物、开明人士作过斗争，推动着新教育发展，桐城的吴汝纶就是其中的一位。汝纶先生学博识卓，曾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后赴日考察教育，更感教育乃富国强兵之要素，所以他一归国，立即回到安庆倡办桐城中学堂。可是，桐城县令蒋师辙多方掣肘，吴同蒋争执不成，就通过他的朋友、巡抚总文案江硕海立案办文，径由抚院札饬桐城县照行，县令及顽绅不敢反对，桐城中学堂终于开办起来。吴先生于一九〇三年病故以后，桐城中学堂从安庆迁回桐城县城，重建校舍扩充兴办，对于桐城教育的发展，此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学校教育的宗旨和学制

安徽在这一时期的各级各类学堂，奉行的是清王朝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通行的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癸卯学制”。但在学制方面，安徽的实际情形又有所变动：第一、增加了半日学堂、识字学塾、法政讲习所、法政简易科、自治班、初级师范选科、师范讲习所、保姆讲习所等学堂；第二、“癸卯学制”规定高小毕业才能升入中等实业学堂预科，而在安徽可以升入本科，只有初小毕业的学生才进预科，如官立中等实业学堂就是这样做的；第三、“癸卯学制”规定中学毕业只能升入高等学堂预科，而在安徽，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本科，未毕业的才进预科。至于各学堂的修业年限，基本上是按照“癸卯学制”执行的，但也略有不同。如有的因某项人才急需，有的因学生年龄过大，其修业年限即可缩短。这种变通的做

法，从安徽高等学堂的情形可见一斑。这所学堂创办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是当时安徽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由求是学堂和敬敷书院合并而成的大学堂。按照定章，该堂的学生应从中学毕业生中考选，但在开办之初，没有中学毕业学生，只得选录前在大学堂肄业的学生和具有中国经史文学根底的士人入学。这样，学生的“学年学资势难一律”，故班次之编定、学科之教授，数经变动，没有定规。一九〇六年，福建学者严复到堂担任监督，他针对上述现象，将学生一律改为预科，并“择其年龄较长或在堂已久或程度较深者别为一班，补习中学各科，期以一年毕业”；又因师范教育未兴，于补习班加授教育诸学。次年复于预科中挑选师范一班。直到一九〇九年，该堂才开办本科一班，学生只有十二人，另有预科四班，学生共计二百一十四人。本科传授高等学堂学科，预科学习中学高年级课程。因此，高等学堂实际上是一所以中等教育为主，兼有高等、师范教育的混合学校。这虽不合当时学制的规定，但却是根据实际应作的必要变通。

当时，清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安徽各学堂均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初等小学堂招收七岁以上儿童，开设的课程有必修科八门：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随意（选修）科有图画、手工两门。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所设课程同初小基本相同，只是必修科加上了图画为九门，随意科除手工外，还有商业、农业等科目。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以作官、从事实业和升学的准备作为办学的宗

旨，所开课程为十二门：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可以不开）、图画、体操。一九一〇年，中学堂实行文、实分科制，文科重经学，实科重工艺。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也有各自的办学宗旨和教授科目。以上所述，都是清政府的定章，安徽实行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同。例如，安徽中学堂自一九〇三年起，一般只开设十门课程，个别的（如庐州中学堂）也只设十一门。而且，从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八年，全省中学堂缺体操、图画两门课的是普遍现象，缺博物和理化两门课的也为数不少。又如，安徽的中学堂乃至高等小学堂，学生的来源及程度、年龄也不大合于规章。中学堂的学生大都是生员廪监，年龄自十八岁至三十岁不等，程度参差不齐；高等小学也存在秀才与学童同班学习的现象。至于教学方法，虽然章程中规定要注意“循循善诱之法”，纠正从前的死记、死背的学风，但实际上还是注入式的教学，“学生稍不留意，则教鞭随其后”。学堂的假期，除遵章放寒、暑假和例假以外，还就本地风俗规定了三个节假日（清明节、上元节和中元节），以便本地学生回家扫墓。

清末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特征。这从当时安徽的教育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教育制度方面，停废科举以前，新教育同旧科举并行，全省中等以上学堂的学生多是科举旧人，他们把学堂作为进身之阶，以求取功名、资格为目的。不少秀才入学堂就读，许多学生在毕业以后又参加科举考试，谋取科举功名。及至科举停废，法政学堂、大学堂、高等学堂以及府、州中学堂等毕业考试还仿照科举形式，毕业奖励又皆按照等级给予科举出

身资格。由此可见，在新的教育制度中保留着浓厚的科举制度色彩。在教育内容方面，全省的各级学堂都特别注重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初等小学堂五年，每周上课三十小时，读经讲经为十二小时，占全部课时五分之二；高等小学堂四年，每周上课三十六小时，读经讲经为十二小时，占全部课时三分之一；中学堂每周上课三十六小时，读经讲经为九小时，占全部课时四分之一。另外，中小学堂每天还有半小时的“温经”时间。除经学而外，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英语课程也十分繁重。如求是学堂，学生在修业的四年中，应修的课程为二十门，英语类的课程就有十五门，占四分之三。后来的中学堂英语学时虽有减少，但比重仍然不小。在学生管理方面，封建教规十分森严。那时的安徽各学堂，依照清室颁布的《各级学堂管理通则》，在课堂及礼堂内悬挂《圣谕广训》，“每月朔望及孔子圣诞，由总办及教席率领全堂学生至讲堂内孔子神位（或万岁牌）前行三跪九叩首礼”，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和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不准妄发“狂言怪论”等等。并在各学科外，另立“品行”一门，考查评分，与各科分数合算。所谓优秀者，即予言语（口头）、名誉以至实物奖励；所谓恶劣者，则给予记过、禁假以至出堂（开除）的惩罚。而且罚多奖少，钳制甚严，这样势必激起学生的反感。一九〇五年皖江中学堂所以发生苏、皖两籍学生驱逐教员的斗争，一九〇八年徽州中学堂所以风潮迭起，都有管理方面的病因。至于女子教育，安徽在一九〇六年以前寥寥无几，一九〇六年二月安徽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才有所谓女学。就是这样一所当时称为“条理秩然、功课亦佳”的学校，常年经费仅有英洋一百元，学

生也只有几个。一九〇八年女子学堂虽增加十六所，也仅限于师范和小学，女子在中等以上学堂仍然没有地位。诸如以上这些，都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必然结果。

（三）学校的组织和师资

清末安徽学堂的负责人，最早称为驻堂总办。其后中等以上学堂一般称为监督，有的也叫总教习，小学堂称做堂长。学堂的监督或堂长，官立的多由官府任命；公立的一般是由邑绅、家族公推；私立的有的自任，有的聘请。高等和中等学堂的监督，多是贡举以上出身，有些是达官名流及留学回国的学者。例如，曾任高等学堂监督的严复，就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当时的著名学者。小学堂的堂长得人者不多，有的小学，如婺源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堂长无专人，由五乡轮流派员担任，致使学堂日益衰败。中等以上学堂，监督之下设有分管教务、训导工作的专职人员，称谓不一，或称学监、舍监，或称教务长、监察长，由监督延聘。

那时的教师，一般称做教习，有官府派遣的，也有学堂聘请的。文史诸课的教习，多科举仕人；格致学科开始只有省、府及大县中等以上学堂开设，教习多数是留学生，也聘请了一些日人、英人担任；体操课的教习也多是日本等外籍学人及本省武备学堂的早期毕业生。现在有案可查的，当时在本省学堂担任教习的日人有新井长三郎（高等学堂的化学教习）、早川新次郎（桐城中学堂的教习）等。总之，安徽此时由于学校方兴，师范初创，只得延用科举时代的举人、进士、贡生、秀才充任师资，所以普遍存在师资数量缺乏、质量不高的问题。格致、体操、图画诸课的师资问题更

为突出。这种状况，直到一九〇八年也改变不大。据当年统计，全省二十三所中学共有教师一百八十三名。其中师范毕业的三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他科毕业的八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四；未毕业、未入学堂的六十四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外国人一人，占百分之零点五。这说明当时中学教师中还有不少老夫子，因而这个时期的教育还未脱离私塾、书院的形态。

对于清末安徽学堂的教学质量，因缺乏资料，不能做出全面、准确的分析和估计。但从学堂领导和教师的状况，可以窥见一斑。本省教育界有位老前辈说，当时中等一类的学堂其学生“文史程度，后之大学弗能跻；科学（数理化）程度，后之初中、小学或能过”。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教育行政和教育经费

安徽在一九〇三年以前，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各府、州、县的学堂都由当地长官主持。直到一九〇三年二月，才由安徽巡抚会同江苏巡抚奏准成立“两江学务处”，主管江西、江苏和安徽三省的学务。然而，这个跨省的教育机关很难适应，所以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安徽巡抚诚勋会同两江督抚（管辖苏、皖、赣三省）附片奏准，成立“安徽全省学务处”，经管全省各府、州、县官民所设学堂及留学生。从此，安徽有了独立的省教育行政组织。当时，学务处设总办二人，由藩、臬两司兼任；总办以下设提调一人，主持日常事务；提调以下设文案委员和支应委员各一人，分别掌握文书工作和经费开支。此外，还聘请参议四人，参加重要事件的商议。同年十月，支应委员张赞翼考察湖南等四省

学务后，便草拟了安徽学务处章程，于次年十月经巡抚诚勋批准执行。这个章程，重新组织了学务处的内部机构，并鉴于当时学堂渐增，事务日繁的情况，加设额外差遣委员（相当于后来的督学）若干，“分往各属调查，以凭考核整顿。”

一九〇六年四月，清王朝明令裁撤学政，安徽也就废除了学务处，改设提学使司（相当于教育厅）。首任提学使是沈曾植，其后历任为陈启泰（按察使兼）、冯煦（布政使兼）、沈曾植、吴同甲、张其淦、吴同甲。同时，每州县设一劝学所（相当于教育局），主持地方教育行政。劝学所以本地长官为监督，下设总董一员，由县视学兼任，综核各区之事务。州县劝学所逐渐设立。据统计，一九〇六年为三所，一九〇七年为三十四所，一九〇八年为四十六所，至一九〇九年全省达到五十二所。由于刚刚创立，人才缺乏，五十二个劝学所总董中，仅有师范毕业的五人，留学日本的一人，其余的除去资格不明的六人外，还有四十人为廪生、贡生、举人、教谕、州同、州判、训导等出身。每县又划分若干区，每区设一劝学员（专职教育干部）。劝学员由县总董遴选，本区绅衿呈请地方官札派。劝学员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本区筹款兴学事宜，承办上级交办事项，并调查学龄儿童，随时册记，挨户劝导，介绍送入学堂。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劝学员能做到上述诸项的实在太少，大多是敷衍塞责，应付上差。

为了培养、提高教育干部，安徽在一九〇八年四月，于提学使司附设“教育官练习所”，选聘精干教育者讲演，自提学使以下所有学务职员群聚讲习。提学使沈曾植还以地方

官皆有监督学堂责任的理由，规定同通州县一经得缺，先饬到所听讲，俾知教育行政之概要，然后赴任；其他候补各员有愿听讲者，均可分期入所练习。到一九一〇年，该所先后毕业七十五人，修业七十一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六十七岁。

当时作为教育行政辅助机关的是教育会。安徽教育总会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间。它是由士绅自由组织的专门研究教育的社会团体，会长是陆军部主事童挹芬，副会长是湖南永顺府知府吴传绮，有会员九十一人。后考虑到皖南、皖北情况不同，又于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先后成立皖北、皖南教育分会。皖北教育分会在省垣，正、副会长分别由湖北候补道李国棟、安庆府教授孙传澍担任，有会员七十五人；皖南教育分会驻江宁，由度支部主事吕祖翼、中书科中书胡璧成分别担任正、副会长，有会员六十七人。州、县也设教育会，但直至一九〇九年才仅二十七所，还不及全省州县一半。

清末安徽的教育状况，还可以从其经费上来估量。当时的学堂分官办、公办、民办三种，所以经费来源也是多渠道的。官办学堂的经费，一般由藩库划拨；公办学堂的经费，除由政府补助的少数者外，有的是靠校产或庙产的收入，有的是靠交公的租税或现款，也有的是靠士绅派捐或自捐；民办学堂的经费，主要靠私人投资或士绅募捐，官方也给少量补助。学堂的经费，除开支教工薪金及基建、设备费用等项目以外，也有少部分直接用于学生。一九〇八年以前，学堂一般都发给学生伙食费，对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还设超等、优等、一等三种奖学金，以资鼓励。

那时，各类学校的经费都很困难。据一九〇八年（光绪